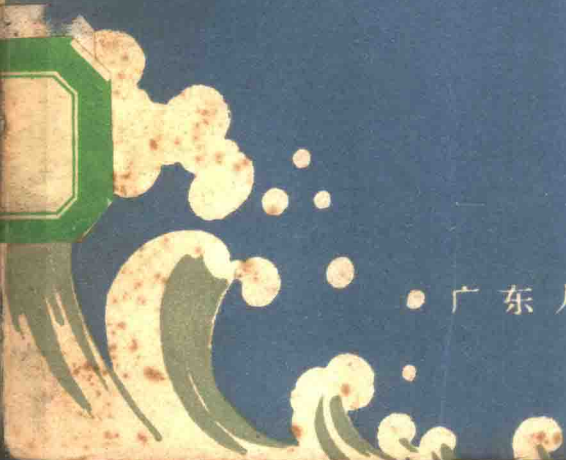


浪花集

贺朗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book cover. It features stylized waves in shades of green and white, with small white clouds or foam. The waves are depicted with a sense of movement, curling upwards. The entire illustration is set against the dark blu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浪花集

賀 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桌子，
短論
藝思
些問
主題

浪花集

賀朗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統一書号: 10111·411

开号: 1564·787×1092 1/32·6 印张·120,000字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7)五角四分

內 容 簡 介

这个集子，收集了作者近一两年来，特别是文艺界反右斗争中所写的文艺短論和評論文章二十六篇。一部分文章是批判右派分子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反动作品的；一部分文章分析了文学創作和文学批評中的一些問題；还有一部分文章是介紹了一些优秀作品，分析了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結構和人物塑造。

目 录

关于創造英雄人物的修正主义·····	1
——批判右派分子杜黎均、唐擎等的反党文章	
不能以资产階級“写真实”代替馬列主义	
文学的党性原則·····	22
——駁杜黎均的“关于周扬同志文学理論中的几个問題”	
“暴露黑暗”論的反党实質·····	31
——从丁玲的“在医院中”談起	
“創作自由”論的貨色·····	38
——从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談起	
肃清灵魂中的銅臭·····	46
从“天才論”看刘紹棠的反党面目·····	51
斥技巧至上主义·····	57
在“因人制宜”論的后面·····	63
想怎样写与应该怎样写·····	67
动机与效果·····	72
不要做荒島上的魯宾遜·····	75
此路不通·····	80
——由老丁所想到的	
是“唯冲突論”或是“无冲突論”呢？·····	86

有了生活为什么沒有写好	92
“赶任务”与公式化概念化	97
談“大作品”和小形式	101
文学創作与想象	104
——从青年作者的創作所想到的	
民歌是生产斗争的武器	116
——广东民歌讀后	
这是什么样的爱情？	127
——評蓝珊的小說“裴立英”	
应该注意这样的批評	134
——評易征同志的“用什么批判恋爱至上主义？”	
苏維埃人民的英雄贊歌	141
——讀巴甫連柯短篇小說	
草原上的一首頌歌	150
——讀瑪拉沁夫的“春的喜歌”	
工业战线上的英雄	156
——讀“春天来到了鴨綠江”	
英雄好汉李大貴	161
生命的火花	170
——讀“永不熄灭的火焰”	
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	176
——“战友的故事”讀后	
小記	184

关于創造英雄人物的修正主义

——批判右派分子杜黎均、唐摯等的反党文章

当去年国际上的修正主义逆流向社会主义陣营冲击的时候，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从中得到了鼓舞，他們紛紛举起修正主义的白旗，疯狂地向党进攻。

这个时候，右派分子杜黎均、唐摯等就充当了反党的急先鋒。杜黎均首先在1957年6月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周扬同志文学理論中的几个問題”，这篇文章，起了呼风喚雨的作用，一时间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唐摯接着就在1957年“文艺报”第十期上发表了“煩琐公式可以指导創作嗎？”的反党文章。据了解，当时西安的右派分子王愚，广东的右派分子易珉等，也写了类似这样的反党文章（未发表）。他們一致攻击周扬同志关于創造新英雄人物的正确的文学理論，并悻悻地指摘它是“教条主义”。他們以资产階級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观点，在創造新英雄人物的問題上，提出了一套资产階級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企图以它来代替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反对馬克思主义文学的党性原則。

当然，我們認為，关于創造新英雄人物的問題，是文学創作中的重要問題，过去在文艺界曾有过爭論的，如果我們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創作，为了創造出更多的新英雄人物，繁荣我們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們对創造新英雄人物的問題提出来討論和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唐肇、杜黎均等并不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相反地他們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創造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出发，以反对教条主义作幌子，来反对党对文艺的領導。从而販賣他們的資產階級修正主义的私貨，企图要將我們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拖回到資產階級的絕路上去！因此，我們对这些关于創造新英雄人物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就有进一步批判的必要了。

唐肇、杜黎均等反对党对文艺的領導，首先是从創造新英雄人物入手的。他們所采取的战术，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样，就是：“攻击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先把周扬同志报告中的某一句話，單独地抽出来，断章取义地进行歪曲，錯誤地發揮，然后就在这个歪曲的基础上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

唐肇、杜黎均等主要是針對关于英雄人物成長过程，以及写英雄人物是否写缺点等問題，来向周扬同志进行攻击的。关于描写英雄人物成長过程的問題，他們在文章中，首先引用了周扬同志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为創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报告中的一段話：

在我們的作品中可以而且需要描写落后人物被改造的过程，但不可以把这看成为英雄成長的典型的過程。

他們就把這句話从文章中單獨抽出来，进行了歪曲和錯誤的發揮，大做反党文章。他們并对這句話作出了这样的結論：周扬同志就是主张由先进人物到更先进人物，才是英雄成長的典型的過程，如果是描写落后人物被改造的过程，就不是英雄人物成長的典型的過程。接着，他們就悻悻地指責說：这是“教条主义”，是給創作规定了一个公式，給作家們“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縛”，使作家不能更勇敢地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去描写生活，去創造人物。唐摯、杜黎均等这种把完整的正确的論点强加割裂，錯誤解释，片面發揮的做法，竟达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

其实，只要我們采取不是主观武断，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周扬同志整个报告的精神出发，从当时文艺創作上流行着的“从落后到轉变”的公式主义的情况出发，周扬同志报告中的這句話，是无可非議的。并且也很难从這句話里就得出象唐摯、杜黎均等这样的結論来。

周扬同志這句話，是針對当时在創造英雄人物上，流行一种歪曲生活、公式主义的“从落后到轉变”的創作傾向而提出来的。自第一次文代会到第二次文代会的四年中，我們的文艺創作虽然也出现了一部分比較优秀的作品，它們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但是在創作上却存在着缺乏新的感情，缺乏新的人物，并且流行着“落后到轉变”的錯誤的創作傾向。

这种創作上的錯誤傾向，与当时馮雪峰、陈企霞所主持的“文艺报”对新英雄人物討論所引起的思想上的混乱有关。“文艺报”在1952年第九期上，就开始进行了关于創造新英雄人物問題的討論，关于这个討論，在“編輯部的話”里也承認了当时文艺創作上流行着“从落后到轉变”的公式主义，缺乏新的人物。那么，按理“文艺报”在这次討論中，应该很好解决当时文艺創作中的落后狀況——缺乏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感情，新的主題，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但是“文艺报”的实际做法却不是这样。馮雪峰、陈企霞对当时在討論中有人提出要写新型的英雄人物，是表示反对的。在当时的“編輯部的話”里就說：

在討論中，也显然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并不妥当的看法，这主要表现在：有些意见在提倡大力表现新英雄人物的同时，由于对問題的各方面缺乏比較全面的观察，而只是籠統地、或者几乎是絕對地来反对触到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反对处理“落后”人物的“轉变”問題，从而就在實質上否認了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这种不适当的討論方法和片面的論点，已經在讀者中造成了一些認識上的偏差……。（“文艺报”1952年第九期）

从这“編輯部的話”里，我們很难看出当时馮雪峰、陈企霞在他們主持的“文艺报”上，对进行关于創造英雄人物問題的討論，有什么明确的积极的态度，相反地却引起人們这样的感觉：如果反对描写“落后”人物的“轉变”，就是“在實質上否認了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本来，当时人民日报一篇題为“繼續为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的社論中，就指出了当时文艺創作中的落后现象。社論說：“在我們的許多作品中，还没有創造出真正可以被千百万人

当作学习的榜样的人物；而这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很不缺少，他们是推动生活前进的先进力量。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揭示这种力量，用最大的热情来表现这种力量，使他成为千百万人的榜样，鼓舞人民去为美好的理想而斗争。”那么，生活中既然存在着大量的没有缺点的、真正可以被千百万人当作学习的榜样的人物，为什么不写他们，而要写那些“从落后到转变”的人物呢？难道提倡大力表现新英雄人物，就是“在实质上否认了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吗？这显然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在作品中没有很好创造出真正可以被千百万人作为学习榜样的英雄人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文艺创作上流行着“从落后到转变”的公式主义。而“文艺报”在这次讨论中，不但不针对这种创作上的落后情况进行讨论，很好地加以解决，而相反地却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想混乱。其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当时主持“文艺报”的冯雪峰、陈企霞自己本人就是反对描写新英雄人物，提倡写“从落后到转变”的英雄人物的。冯雪峰在1953年第二十四期的“文艺报”上所发表的“英雄和群众及其他”这篇文章里，就是宣传这种主张的。他说：“在艺术形象上，所谓庸庸碌碌的人们，仍然也是重要的主人公，要出现在各种各样被否定的、被批评的、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典型里，并且要出现在新生人物——也即是新人物的形象里。”这句话告诉人们，英雄人物就是那些“各种各样被否定的、被批评的、被教育和被改造的”的人物。如果要创造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必须有一个“从落后到转变”的过程。作为当时“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发表这样的意见，显然给当时新英雄人物讨论带来极坏

的影响。其实，当时馮雪峰、陈企霞等人也正极力宣扬他們这些反党的文艺思想的。

也因为当时在創造英雄人物問題上的思想混乱，并流行着一种“从落后到轉变”的錯誤傾向，因而在文艺作品中，經常出现了“二流子轉变”的现象，并且对落后事物描写得活灵活现，而正面的人物却写得軟弱无力，面目模糊，邪气压倒了正⁴气。同时由于作者自己那些未經改造的資产階級思想意識的作祟，因而常会把这些现象作了十分歪曲的渲染和夸大的描写，完全失去了生活的真实。这种“从落后到轉变”的創作方法成了一种公式，在作品中就每每出现二流子轉变，二流子要轉变，乡長就出来講話，观众也就討厭了。这样的作品，自然很难起到对人民教育的作用。同时，这样就往往使得一些作者，从这个“从落后到轉变”的概念出发，然后到生活中去寻找“落后”的材料，在作品中或舞台上，讓人物出了洋相以后，就給他們安排了一条“轉变”的道路。这，在当时已經成为一种不良的和危险的創作傾向了。

周扬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在这个討論和研究文学創作的文代会上，把这个問題提出来，并根据现实生活发展的邏輯，強調写我們现实生活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的新英雄人物，反对創作上这种“从落后到轉变”的公式主义，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同时，我們就周扬同志这句话的本身来看，也是无可非議的。依我的体会，周扬同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說：描写落后人物被改造的过程，不應該看成为英雄人物成長的唯一的过程。因为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的成長，是有經過“从落后

到轉變”的过程，也有更多的是未經过“从落后到轉變”的过程的。虽然是这样，但周扬同志也并未否認英雄人物的成長有經過“从落后到轉變”的过程。因此他在报告中就肯定了“从落后到轉變”的英雄人物，“可以而且需要描写”。但是那千真万确的事实在我們面前摆着：那些未經过“从落后到轉變”而成長的英雄人物，在生活中是多数的、大量的、最普遍的、最有代表性的。因而周扬同志在沒有否定写“从落后到轉變”过程而成長的英雄人物的前提下，強調要写未經过“从落后到轉變”过程而成長的英雄人物，这也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现实生活本身，有力地告訴了我們这样的事实：固然有經過“落后人物被改造”阶段而成長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有更多的未經过“落后人物被改造”阶段而成長的英雄人物。比如董存瑞、刘胡蘭、黃繼光，苏联的馬特洛索夫等等。唐摯、杜黎均等也承認了这样的事实，認為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那么，为什么当周扬同志提出要写未經过“落后人物被改造”阶段的英雄人物的时候，唐摯、杜黎均等就悻悻地指責：这是“教条主义”，給予創作帶來“生硬的框子”呢？如果按照唐摯、杜黎均等人的主张：英雄人物只有一种，作家只好写“落后人物被改造”而成長的一种英雄人物，这难道就不是规定作家要这样写或那样写么？不是給創作帶來“生硬的框子”么？这难道不就是教条主义么？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看出唐摯、杜黎均等的政治观点和階級偏见了。

唐摯、杜黎均等人，既然是反对描写社会主义新英雄人

物，而主張寫“落後人物被改造”過程的英雄人物，那麼，在創造英雄人物的另一個問題上，他們就必然主張寫英雄人物要寫缺點。因此他們就極力反對周揚同志在報告中的這一段話：

英雄人物的光輝燦爛的人格主要表現在對敵人及一切落後現象決不妥協，對人民無限忠誠的那種高尚的品質上……英雄人物並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是完美無疵的，他並非沒有缺點，但他對他自己的缺點採取不調和的態度，他能夠勇敢地接受群眾的批評和勇敢地進行自我批評；這正是一種優秀的品質的表現。當然，這決不是說作家寫英雄的時候都要寫出他的缺點，許多英雄不重要的缺點在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應該忽略的。至於一個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絕不相容的政治品質，道德品質上的缺陷和污點，如虛偽、自私，甚至對革命事業發生動搖等，那就根本不成其為英雄人物了，他還有什麼價值值得人去稱贊和歌頌呢？我們的作家為了要突出地表現英雄人物的光輝品質，有意識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點使他在作品中成為群眾所嚮往的理想人物，這是可以而且必要的。我們的現實主義者必須同時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

由於右派分子和我們站在不同的立場，因此對這段話我們同右派分子就有截然兩種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他們對這段話給予惡毒的歪曲，並悻悻地指責說：周揚同志這段話，“是給創造英雄人物制定出一個‘應當這樣寫，應當那樣寫’的規格來。要寫英雄，就得寫一個完美無疵的英雄，一個‘理想人物’。”其實，誰也沒有給創造英雄人物制訂任何規格，這是他們的胡說！在這裡，顯然可以看出唐摯、杜黎均等人，是反對作家描寫沒有缺點的成為群眾所嚮往的社會主義新英雄人物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和右派分子有着原則上的分歧，那就是：作家要不要創造社會主義新型的英雄人物？作品要不要用社會主義思想去教育人民？以及作

品是为誰服务的等等。右派分子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以资产阶级文艺观点来看待这些問題的，因而他們对这些問題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他們主张創造英雄人物要写缺点，反对我們描写成为群众向往的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这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我們看来，周扬同志的这段話是完全正确的。我們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輝品質，有意識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的原則和要求的。我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必須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我們的作家应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出发，創造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人物，来展示我們美好的明天。

同时，周扬同志这些話，也是針對当时在創造英雄人物流行着一定要写缺点这种錯誤傾向而提出来的。当时在創造英雄人物問題上就有这样的錯誤看法：認為人一定有缺点，只有写了缺点，才能把人写“活”，人物才有个性。因而缺点就成了新英雄人物的条件了。于是每写到英雄人物时，都加上一些缺点。他們以为不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英雄人物便抽象化了，沒有个性了。甚至有人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为理由，主张写英雄人物的“动摇”。他們所指的“动摇”，就是政治上的动摇。这种种看法，都是十分錯誤的。試問：如果描写英雄人物时要把他处理成为一个政治上动摇的人物，这有什么好处呢？动摇是资产阶级的特点，不是革命战士、人民英雄的特点。当然，我們并不反对描写人物的动摇，在苏联和我国的許多文学作品中，也写了人物在政治上的动摇，但是这些人物，并不是我們所理想的成为千

百万人所向往的英雄人物了。因此，周扬同志针对这些情况，提出英雄人物可忽略缺点，或不写缺点，使得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更突出，这完全是对的。而周扬同志所说的“缺点”，自然不是指那些与英雄人物性格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和污点，比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发生动摇等等。假若一个人有了这些政治和道德品质上的缺陷和污点，自然就不可能成为英雄人物了。而人物性格上的某些粗暴、小脾气，或者是在成长中的某些缺点，我们是可以忽略的。

再就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对生活进行集中概括的特点来说，在创造英雄人物时，作者根据作品的教育意义，从真实生活的基础出发，可以利用概括和夸张的手法，把人物某方面突出地描写，或对某方面加以忽略，从生活中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英雄形象。对这个问题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了明确的指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这些话，实际上就是指示我们在创作方法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出新时代的为千百万人学习的理想英雄人物。我们描写英雄人物，可以写他一生的英雄业绩，也可以写他的一个生活片断。在作品中写其英雄业绩的同时，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可以写其前进中的某些缺点；也可以只写其英雄业绩，而忽略他的缺点。这完全是从生活真实出发，根据作品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原则来考虑的。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从我们伟大的

社会主义现实出发，把扶持新事物的成长看做自己的崇高任务，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新英雄人物的描写，来体现出新兴的社会力量战胜旧事物的复杂过程，这样忽略其中不重要的缺点，使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更突出，这完全是可以的。

关于这，在我们许多的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曾有其先例。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的伟大作品——“母亲”，它的主人公伯惠尔，高尔基是根据索尔莫沃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人彼得·查洛摩夫作原型的，但作品中的“沼地”事件却与彼得·查洛摩夫——伯惠尔的原型——无关。在“沼地”事件中领导工人反对工厂经理的斗争的，主要是一个热烈的政治教育工作者道罗菲耶夫。然而高尔基为了更好地突出描写伯惠尔这个工人领袖的光辉品质，就把“沼地”事件集中在伯惠尔身上去表现了。因而在小说中，伯惠尔就以反对非法克扣工人工资的运动的鼓动者的姿态出现（见卡斯托尔斯基的“高尔基论”，俄文版第三一八页）。这，不仅使得伯惠尔这个人物更崇高伟大，并且也加强了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伯惠尔这个英雄人物，成为当时工人们学习的榜样，鼓舞大家前进的理想人物，直到今天，也仍然散发着他的英雄光辉。因此，这种对生活进行艺术的概括和夸张的表现方法，是文艺创作本身所具备的特点。高尔基在“文学漫谈”中批评文学家对他们创造的人采取表面的、不经意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批评他们用官场的冷冰冰的赞词来叙述他们的人物。高尔基说：“他们不了解，真正的艺术有权夸张，海勾力斯们，普洛米修斯们，唐·吉珂德们，浮士德们并不是‘幻想的果实’，而是对实际生活完全入情入理的，必要的